

把世界扔进一个巨大的分液漏斗,静止时大致会分为三层,包括记者在内的大多数人身处体积最庞大的中层,大家一刻不停地做着布朗运动,构成火热的生活。记者是其中有可能突破上下界面而提供另两层图景的人,他们的突破能力,决定了受众可能获知世界的丰富和复杂。

——李宗陶

李宗陶对话文化名人

记者 董蔚

李宗陶,《南方人物周刊》资深主笔,为国内许多文化名人做过访谈。对于一个刚上路的文化记者来说,采访她无疑是一次取经的好机会。

最早知道这个名字,是两年看《南方人物周刊》上一篇有关杨二车娜姆的访谈《我的身体 我的灵魂 我的生活》。那是一个没有一丝江湖味的女人和一个全身江湖气的女人之间的有趣对话。温和但不失睿智的提问,让人很容易就记住了采访者的名字——李宗陶。后来才知道,刚入行的时候,她还在都市快报当过几年记者。

两年后,李宗陶的文化名人访谈集出版了,书名叫《思虑中国——当代 36 位知识人访谈录》,收录的是这些年她与文化界精英们的对话,当然杨二车娜姆不在其中。



贺友直在访谈中对李宗陶说,喜欢赵树理,鲁迅难画。 雍和/摄



王元化和妻子张可摄于杭州九溪十八洞。

《思虑中国——当代 36 位知识人访谈录》
李宗陶 著
新星出版社
2009 年 3 月版,36.00 元



彰显悲悯与责任

这是一本文字漂亮,同时又不失深度的访谈录。王元化、余英时、阿城、刘索拉、陈丹青……对于会捧起《思虑中国》的读者来说,这些名字起码不会陌生。

入选的 30 多篇文章都是李宗陶亲手挑选的,书名也是她自个儿想的。当时就有朋友跟她说,市面上含“中国”的书有一大堆,你一个女人家也“中国”,还“思虑”,怪吓人的。李宗陶笑了,管它呢,切题就行。

按她的说法,中国是此书的主线,所有的言谈都从这条主干展开。“我希望彰显当年从快报习得的、作为一个媒体人的价值:悲悯与责任。我希望通过此书,读者能获得一个 21 世纪初年,知识分子言说历史与当下的行进中的文本——这可能使它有某种文献价值。我更希望 10 年后,自己翻阅此书时,不至羞愧。”说得很是动情。

思虑当下热点问题

当《思虑中国》出版后,有人拿它跟李怀宇的《访问历史》做比较。这也难怪,两人都是文化记者出身(李怀宇曾赴《南方都市报》副刊记者),出版的也都是文化名人的访谈集。学者许纪霖就曾说过:“国内记者中专跑文化人、知识人的,写得最好的一个是李怀宇,一个是李宗陶。”

面对外界的比较,李宗陶只是谦虚地表示:“李怀宇擅长讲故事,文气是不慌不忙的。我希望自己能在谈问题上有所突破。”

也许,可以从书名上略窥两者的一点不同。《访问历史》中,李怀宇叩响的是历史之门,重寻文化名人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而李宗陶更多的是直面当下,思虑着中国现实的、行进中的问题——环保、艾滋、弱势群体……

先“死掉”再谈幸福

对一个女文青来说,跑文化线应该是一份幸福得可以死掉的工作吧?曾经想当然地以为。

李宗陶却纠正了这种想法:“这好像是一个先让你‘死掉’再谈幸福的职业。”

“每写一篇都像谈一次恋爱。用心灵写作是通往上乘的必要条件,但很伤。”一个简单的“伤”字,包含了一场成功的访谈所花的心思和精力。

在《余英时:中国学术破坏得太厉害》一文的采访手记中,她这样写道:“慢慢在啃余英时的十卷文集。前面三卷 2005 年翻过,《重寻胡适历程》是以前唯一读过的单行本,其余的,慢慢啃,急不来的。只是囫圇有个了解,否则哪里敢提问。”“稿子终于成了。先是一万三,我自己删到一万一,编辑删到一万。今天看到定稿,欲语,忘言。晚餐好胃口。”

众多访谈中,对王元化的采访是李宗陶至今印象最深的一次。整个过程历时半年多,前期采访了林毓生先生、李子云女士、他的学生胡晓明、他在宣传部时的秘书陆晓文、晚年助手蓝云、他的儿子王承义等等,至于阅读的文和资料更是一份长长的目录清单。

“采访学者文人,我的体会是:除了做好书面功课,行止进退尤需掌握分寸,这个群体相对较为严谨、敏锐,一句话讲得不当,很可能前功尽弃。”

有所不问 八卦免谈

30 多篇访谈录可圈可点的很多,个人尤其喜欢阅读王元化、贺友直、陈晓卿等人的访谈。王元化与妻子张可关于莎士比亚与契诃夫谁更出色的争论,充满生活气息;看贺友直那篇夹杂着沪语的闲聊,字里行间全是家长里短的故事;中央电视台陈晓卿讲的那些个拍片趣闻,一样诱人得很。

在每篇访谈实录前,李宗陶都会用一些陈述性的介绍文字来营造一种阅读气氛。恰当的放与收,很能见出作者的文字功力。

想看八卦、花边的读者,很抱歉,没有。这不是一本时髦的文化书,不走那种挑几个粉丝众多的文化明星,然后通篇扯八卦的路子。李宗陶一贯的原则是:有所不问。“世界很大,八卦只是一部分。只有八卦,岂不单调?”

那何处是这个“不问”的底线?就在受访者的脸上——眉头开始打结了,眼神开始凌厉了……这时就意味着你好住嘴了。

往事考

撇开作者自身的局限性,抱着一种品读历史的客观心态,此书显然有助于我们多维度了解日本历史、政治、文化和国民心态等等。

日本投降前 24 小时都发生了什么

文/韩戍(长春)

1945 年 8 月 15 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公布了无条件投降的诏书。这一历史上称为“玉音放送”事件,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盟国的胜利全面结束。

也许,在不知情者看来,它不过是日本在遭遇广岛、长崎原子弹重创和苏联对日宣战之后,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其实,对于包括皇室和政要们在内的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这一天在他们生命中可能是最漫长的。

因为短短的 24 小时内,他们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悲情和幻灭。也是在这 24 小时内,日本政府在投降还是做最后的顽抗之间摇摆不定。有关这个艰难抉择过程的全记录,当属半藤一利的《日本最漫长的一天》。

1

这本初版于 1965 年的著作,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史书,而是一部生动的纪实文学。但因文学表达的灵活性,加上以密档和日记等为基础的一手丰富资料,使本书成为日本国内无出其右的二战史著。

众所周知,作为君主立宪国家的日本,在最初决定发动侵华战争时,就是令出多门,政策反复摇摆。矛盾主要存在于内阁和军部之间,内阁对发动侵华战争持保守和稳健的态度,而激进分子构成的军部则数次蓄意挑动兵变,主张速战速决。在本书中,我们同样看到,即使日本在经历广岛、长崎致命的核打击,败局已定时,军方强硬分子依然主张不惜一切血本,以本土为基地,顽抗到底。半藤一利对以陆相阿南为首的军方强硬派的行动做

了细致的刻画,比如他谋划以武力清除政府中的反战派,兵谏天皇,集结残存力量,准备为保卫本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等等。尽管天皇最后痛下决心,令全体臣民“忍最难忍之事”,使他们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但中间的博弈和反复比比皆是,反战派战胜顽固势力也困难重重,读来不禁让人有一种惊心动魄之感。

2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无论是强硬的军国主义者,还是政界的反战要人,即使在或战或降的意见上存在着分歧,但其行为最终都是以“尽忠”为指向。这样的“忠”既包括对天皇的忠心,对国家的忠诚,也包括对所谓帝国精神的忠贞不渝。本书作者的思路,也多半是围绕着“忠”这一主题展开的。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为著名昭和史学家和作家的半藤一利,对战争虽不抱好感,描写的也是日本军政要人失魂落魄的场景,但他对他们的行为和以往的战争责任,几乎没有批评和否定。

当然,本国人写本国史,在立场上肯定会有所倾向。对待这种以细节取胜的纪实性史著,或许不该轻易做道德评价,但也不妨认为,半藤一利在著书的过程中,还是带有一种隐约的哀伤或同情之感,对于那场突如其来核打击和“8·15”那段有辱国体的城下之盟,他和书中人一样,都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情绪。

3

这或许也是当时日本从皇室到民间反战潮流之外的一种普遍情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 1945 年 8 月 10 日,日本

通过瑞典、瑞士两中立国向盟国发出《日本投降照会》时,丝毫不提战败和责任问题,而是冠冕堂皇地说:“日本天皇切望促进世界和平,早日停止战争,俾天下生灵得免于因战争之持续而陷于浩劫。”

由此可见,直到最后一刻,日本政要对战争的性质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将战败说成终战,以外交辞令闪烁其词。所以全书阅后,我们欣幸日本天皇和大臣们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投降的最后决断,同时更要看到,大多数右翼人士对战争的责任并没有做彻底的反省,这样的历史性决定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迫于时局的无可奈何之举。此种思想作为一种潜流,至今仍未断绝。



《日本最漫长的一天——决定命运的八月十五日》
[日] 半藤一利 著
杨庆庆、王萍、吴小敏 译
重庆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版,24.90 元